

利益务实与规范折衷

——中国巧女故事中的民间女性德才观探赜

◎
康
丽

巧女故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库藏中的宝贵财富。它们传承的历史相当久远，流传的地域也十分广泛。这类故事基本上是在以家庭或家族问题为中心的境域中展开的，主要展现了民间女性在解决难题时的机智慧点和迎接挑衅时的勇敢泼辣。巧女们所显露的聪慧，不仅大大增加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也使得这类故事在民众质朴的口语表述中代代相传。

巧女故事同其他生活故事一样，通过教益或审美的形式讲述民众对自身生活的认识。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将民间故事看作民众传达观念和宣泄情感的手段，那么吸引我们去探究的，首先是故事与现实形成反差的部分。拿巧女故事来说，巧女们机智的言词、勇敢的作为，都与中国社会的实际传统——女性低下的文化地位与言行规范上的极度保守——有所差异。这部分是民众的渴求在被严重抑制和禁锢的情况下，产生的逆向后果。其中透露出的反抗或挑战意味，也是体现民众意志的部分。其次，是这种反差背后的文化意蕴。民众在创作民间故事时，可能会营造一个虚拟的空间来讲述自己的欲求。但这个空间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创造。因此，隐匿在反差背后的就是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思考^①。分析故事中存在的反差及反差背后的文化意蕴，实际上就是在探查民众的思想及他们赋予故事的



意义。

本文对民间女性德才观的探讨，主要是在解读巧女故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缺失了故事具体讲述语境的动态信息，使得固化于文本中的民众认知不一定是以原有的表达形式存留下来的，可能会造成传达变形和阐释误读。因此，在论述时，也适当地添加了笔者的田野材料。

利益为先：务实的守护之才

民众的创作初衷是质朴而实在的，他们将自己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如何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纳入了巧女故事的表述之中。通过巧女的言行来传达他们的持家要求和处事原则。女性智慧的实际应用，使巧女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持家能人和处事高手。她们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持家守业的能力，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而这两种才能又是通过手艺、口才和心计三个方面得以展现的。巧女是操持家务的主妇，面对大家庭复杂的内外关系，她们必须手巧，才可领会长辈的意图，做出令人满意的衣物饭食；口利，才会在维护自己和家庭利益时立于不败之地，把对手驳斥得哑口无言；心灵，才能明辨是非利害，持家守成。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持家、发家是老百姓日常关注的要事，因为家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家庭或家族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与声望。家翁或家婆对家产控制权的转让，给巧女提供了显露才智的机会。对于持家权的转让，民众是抱着慎而又慎的态度的，所以在故事中设置了多重关卡以考验巧女的持家才能。总体而言，故事传达了三种要求：一是善于经营的头脑，二是勤俭持家的品性，三是对家务的上手。任何一个承继持家权的人，都必须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试看下面一则故事《三个铜钱的压岁包》^②：

大媳妇拿到压岁包根本不当一回事，第二天大清早，正月初一，孩子吵着要买鞭炮，她随手把压岁钱给了孩子。二媳妇拿了压岁包后，心想：三个铜钱怎么能做事呢？而且还要有意义的事，真是笑话，要是钱多一点，放些利息，倒也不错。可



是,只三个铜钱,唉,算了吧!便把压岁包丢进梳妆盒里,这件事也就丢到脑后去了。……

原来,三媳妇儿在那年除夕晚上,想定主意后,第二天就拿这三个铜钱,买了二个鸡蛋,孵了两只小鸡,过了几个月,鸡就生蛋了。她又把蛋孵小鸡,鸡大了,又生蛋,蛋多了,又孵鸡,就这样鸡生蛋,蛋孵鸡,翻来覆去。第二年,足足有七八十只啦!她又把卖鸡卖蛋的钱凑起来,买来一头小猪。三媳妇儿是个两手不肯闲的人,不上一年,又卖掉大猪,刚好买回一头小牛。

家翁的难题涵盖了持家的三项要求,而且加入了讲述者的道德判断。二媳妇能够想到用放利息的方式以钱生钱,说明她有一定的经营头脑,但老百姓并不认可这种缺少实干的方式,因为这不是长远的持家之道。三媳妇所以成功,不在其经营方式的高深,是在她不浪费小利,是个“两手不肯闲的”勤快人,又是饲养家畜的好手,而且能想到简单实用的蛋鸡相生的经营之道。三媳妇具备了全部的持家条件,才能顺利通过考验,掌握了持家权。故事告诉听者,巧女之巧其实是勤劳与远见的复合。聪颖固然有天赋的关系,但缺少了勤劳好学的品质和日常对家务的熟练,巧女们恐怕也再难称“巧”了。

老百姓懂得“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的道理,他们讲究的节俭和善于计算,主要体现在对小利的节省和运用上。故事讲述的基本是庄户人家的生活,所谓“庄户人的日子就靠个人过”,懒惰是庄户人的大忌。所以长辈看重的就是巧女表现出的勤、节、用。比如《巧选当家人》^③:

这天,老汉在厅门口放倒一把扫帚,在台阶前放着一枚缝衣针,然后叫四个媳妇到厅堂来商量事情。大嫂来到厅堂前,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扫帚,心里想:“拾了扫帚,能看见厅堂脏了不扫吗?莫理它。”跨过扫帚进了厅堂。上台阶时,她见阶上掉着一根亮闪闪的缝衣针,又想一根缝衣针值什么?连弯腰都懒得。紧接着,二嫂、三嫂也来了。她们都想:“你前头走,比我



大,不动手,不弯腰,我也装作没看见吧。”她们也象大嫂一样走进厅堂。细新婢最后到,看见扫帚倒在地上,忙操起扫帚,麻利地把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扫到台阶上看到缝衣针,连忙拾起来别在衣襟上。这些事她做得自然、大方。……老汉指着院子里刚收下来的一堆甘蔗,对四个新婢说:“我想把它当柴烧,只怕烧不旺,看你们谁能想个法子告诉我。”大儿媳抢着说:“劈个对半晒干,入灶一定烧得着。”二儿媳紧接着说:“不,灶里放柴起大火,柴里夹蔗火更旺。”三儿媳却说她们俩的法子都不好,应该劈细甘蔗,浇上松油,烧起火来,赛过蜡烛。……细新婢不慌不忙地说:“嫂子们说得有理,只是好好的甘蔗烧掉岂不可惜?我想不如将甘蔗榨水熬成糖,蔗渣引火自然上火。”老汉……说:“孩子,你回答得好,这蔗就赏给你一人吃。”细新婢……顺着蔗头分给公公、嫂嫂各一节,自己留下蔗尾,说:“公公,让咱们全家‘公甘同味,共尝甜头’吧!”

小儿媳得到家翁的赏识,擅理家务只是原因之一。上两则故事中的妯娌们也可以持家务,差别只在态度和方法上。巧女对待家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是认真肯干的,即便是“扫地、拣针”之类的末节小事,也不会疏于理会。每件事的做法都是经过细心思索后的决定,不会因求成而蛮干,也不会因艰难而畏缩。她们的精明是骨子里的,没有丝毫做作。虽然只是小事小利,却能体现出民间“巧划算,勤劳动”的持家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小儿媳得到家翁赞赏后的行为:将甘蔗分给众人,让大家“公甘同味,共尝甜头”。这种举动的目的是在缓解其他妯娌的不平怨气,维系家庭的和睦。同时也牵扯到巧女的另一方面的能力——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巧女故事里涉及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长辈与晚辈、平辈、邻里、官民等等。每一种关系都等待着巧女——未来的当家人处理。她能否保持家内关系的和睦、家外关系的妥当,都直接涉及家业的兴衰,所以处理家庭内外关系,也成为评判巧女才能的重要标准。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民众要求巧女采用不同的方式。面对家人要委婉含蓄,尽量保持



家庭的和睦。但在处理家庭外部关系时,要分而治之:在来自外界的挑衅不足以危及家庭或个人利益时,要秉持以和为贵的传统;一旦挑衅变为恶意、造成困境时,则要严厉泼辣,运用锐利的语言击败他们,不让家庭利益受到损害。这期间有着老百姓朴实的处事原则:长幼之间的尊重,平辈之间的公平,邻里之间的友善,官民之间的敬而远之。从中不难看出,这种原则的中心仍然是维护家庭及女性自身利益。老百姓不喜欢纷争,但也不惧怕纷争,所以面对纷争,民众的态度是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犯我,我必犯敌。

百姓注重邻里关系,邻里之间的互相往来帮助,对家庭的运作和社区形象是重要的。俗话说,“邻里一条心,黄土变成金”⁵²。所以在邻里争执发生之初,巧女最先采取的是忍让,直到“不赔猫”⁵³变为讹诈,并直接危及家庭经济利益时,她们才会反击。但面对其他恶意挑衅者,尤其是对危及女性自身名节的外来对手,她们无所顾忌,从两性冲突开始就予以反击。在反击时,伶俐的口才是巧女使用的一件利器。比如《想占便宜吃了亏》⁶,二流子狗胜儿想占五姑娘的便宜,结果却被五姑娘痛骂得哑口无言:

二流子狗胜儿……想跟五姑娘套套近乎,兴许能占点便宜……狗胜儿厚着脸皮,接过来说:“管他有德没有德,有个老婆就快活!只要妹你答应我,我把火炕烧得热!”五姑娘气急了,哪肯让他戏弄!狗胜儿的话音未落,她便反击过去:“你妈生你这个货,狗都比你强得多!何不找来你亲妈,拜个天地做老婆!”这下,可把狗胜儿噎住了。

另有一则故事《半张嘴》⁷中,也有巧妇讥讽挑衅者的精彩对话:

周自显(秀才)一听,说:“一个臭女人,我只用半张嘴就能说过她。”说完,他就用膏药把半张嘴粘上了。……周自显一乐说:“快让你老头子下来,不怕驴粪拉在锅里?”女人说:“我那老头子是蠢才,赶驴耕地上锅台,半尺白布兜驴腩,驴粪怎



能掉下来？”周自显一听是在骂自己，赶忙扯下嘴边的膏药。女人见了又说：“驴的屁兜已扯掉，驴粪可要拉出来。”周自显被骂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从上文简析看，虽然在两性冲突中，巧女获得的胜利可能代表着民众有关现实的补偿性想象，但巧女持家处事的才能却是符合现实生活对主妇的要求的。在笔者的田野访谈中，接受调查的老人在谈及对媳妇的要求时，意见十分一致。他们要求媳妇“不嚷架、不惹气”、“稀罕爱做活计的勤勤媳妇”^⑧。这些要求，与故事中所期待的巧女才能如出一辙。可见，社会的变迁虽然在逐渐改变着民众的想法，但他们衡量巧女才能的准绳一直没变，核心始终是维护家庭和女性自身的现实利益。

持重规范：折裂的守规之德

故事中与才能应用相关联的，是民众对巧女的道德要求。礼仪伦常经过民众的诠释，成为维持现有生活秩序的民间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在故事中对女性的要求，具体体现在重孝和守节^⑨两方面。

“孝”是故事借以衡量巧女的重要道德尺度。在现实生活中，女性需要经过男性家族伦理秩序的认同，并承受父系家族对自己的角色指派以后，才可能拥有家族事务的主妇权。那么女性要获得认同就必须顺从“行孝”的民间伦理规范。这种孝道的要求在老百姓那里是简单而实在的，他们需要的是小辈的敬重和老来的衣食无忧，也就是“养儿防老”，为晚年的生活提供一种保障。故事中频频论孝，实际反映了民众对现实生活中子孙忤逆、老无所养的担忧与批判。

在家中向长辈尽孝，这是毋庸置疑的规则。巧女故事中表现孝道的有两类：赡养和避讳，它们分别讲述了在翁媳和婆媳关系中行孝的两种情况。试看下面两则故事：

《治婆婆》^⑩：

从前，有这么个媳妇，对婆婆一成也没有，成天摔筷子溅碗，指狗骂鸡，给婆婆模样看。……把老人赶到一个又破又脏



盛柴草的小屋里……人们都喊这媳妇“母老虎”。人老了手脚不得劲儿，有一回老人一哆嗦把碗摔了。“母老虎”……骂完扭身把饭端走了。一出门看见墙根底下有个喂鸡的小盆儿，“母老虎”顺手拿起来把饭倒进去……打从这儿起老人就使小盆儿吃饭。……孙子媳妇拿起盆来摔了。……孙子媳妇后头跟进来了腔：“奶奶……不给俺留下点儿想头，……你是使不了多少年了，可还有俺娘啦，俺娘老了，俺叫俺娘使什么吃饭？”“母老虎”听了，心里一格登，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溜走了。从这以后，“母老虎”再也不敢对老人不好了。

《巧媳妇传话》^⑤：

从前，有个巧媳妇叫慧儿，非常孝顺。婆婆死得早，慧儿伺候公爹爹象自己的亲爹一样。白天，饭菜做得热腾腾；夜里，炕头烧得热乎乎。公爹行九叫老九，因此慧儿说话时，从来不吐一个“九”字就连“久”、“酒”也讳了。乐得她公爹逢人便夸媳妇好。……“老九回来告诉他一声：东村有个张老九，西村有个李老九，今天是九月九，好久没见了，请他老九去喝酒。”……慧儿说：“东村有张三三，西村有李四五，今天是重阳节，好长时间不见，请爹爹你去喝一壶。”那两个人一听，都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齐声夸奖说：“真是个好又巧又孝顺的好媳妇！”

这两则故事分别说明民间孝道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养老与敬老。前一则故事重在表现养老观念，教育功能显而易见。“饭碗”作为转换孝与不孝的关键，它的净脏，象征了儿媳赡养态度的优劣。儿媳“母老虎”转变态度，也是由于她对自己晚年生活境遇的恐惧。这种恐惧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是相当普遍的，古来“养儿防老、无后为不孝之首”的说法，其实都透露出民众对晚年生活保障的关注与焦虑。故事中存在双重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儿媳，儿媳和孙媳妇。故事的叙述刻意忽略了外界舆论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作用，使婆媳之间非理性的情感纠葛在一



个独立空间内完全地展开,并将行动的主动权赋予媳妇一方。无论是儿媳对婆婆的“虐待”,还是孙媳妇对儿媳的“威胁”,转变现状的行为都是由媳妇一方发出的。作为巧女的孙媳妇是实干的行动者,她的巧在其行为能够游刃于双重关系的交界边缘,既不损及自身的婆媳关系,又能改变家中的不孝状态。比较而言,后一则故事叙述的则是民众对社会孝悌伦常的想象。故事特意设置不雅的名讳,以强调在日常礼仪规范上对老人的敬重,尤其是称谓上的守礼。随着巧媳妇拆解外人的传话,故事表明了对其敬老行为的嘉许,正如故事所说:“真是个又巧又孝顺的好媳妇”。可见,老百姓是非常看重女性身上的孝顺品行的。

故事中的长幼关系是一一出现的。婆媳和翁媳关系的独立展开,为巧女们设置了行孝的难题。婆媳历来是家庭中最难相处的一种关系,她们之间的摩擦多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冲突³⁹。故事在这种关系里谈论养老问题,是从一个极端的视角去观察巧女对孝道的遵守与维护,把恶名赋予不孝者,如母老虎,惩罚她对民间孝道的违背。在翁媳关系中谈敬老,是与实际的生活状况有关:家翁作为实际权威,享有崇高的家庭地位,而且翁媳间很少存在非理性的纠葛³⁹。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孝道的强调,仍是出于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的目的,毕竟,年华飘逝是每个人都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晚年的家庭地位与生活保障是与民众切身相关的重大问题。再者,对待老人态度的优劣,自然会影响到家庭内部关系的协调与否,从而涉及到外界对家庭整体的评价。

总之,两类故事的讲述,宣扬了民众观念中的重孝,同时也对巧女的机智做出道德评判:巧女之巧所以能被大众承认,是因为她们具备尊老尽孝的品性。巧女的才能是她们维护伦理规范的有效武器。

守节是民间伦理规范衡量女性的另一条准则。民众对这种道德要求的强调,在故事里表现为女性反击恶意挑衅时的强悍。巧女们在言行之间卫护的是女性的名节与尊严。她们无一例外的是作为节烈女性出现的。因此,她们不允许任何人做出损害自身名节与尊严的行为。如果说,巧女们在维护家庭利益时的言行是勇敢的;那么她们在守护名节时,可以称作勇猛。她们不再计较言行的分寸,用最泼辣的话语、最强悍



的行为来守护自身的利益。譬如《上坟》^⑧中，五娘子对秀才调戏的怒斥：

清明节，五娘子为去世的公爹上坟，一边哭一边烧纸。有个秀才打这路过，看见一个少妇在哭，眼一溜，没旁人，就说：“一顷地两所宅，既没老婆又没孩。哪位娘子不嫌弃，跟我一块回家去。”五娘子一听，高声说：“酸秀才，甭胡闹，我本戴得公爹孝。丈夫出门做买卖，当年去了当年来。熬瞎你那绿豆眼，看你脖长四腿短。”秀才一听，这个妇人不好惹，灰溜溜走了。

在这类隐语嘲人故事中，巧女们最善应用的是女往的生育能力。这是传统社会所注重的，也是女性引以为豪的能力，所以她们并不忌讳正面谈及，反而将它作为特殊的言语利器，去刺破调戏者的不良居心。又如《吟诗》^⑨：

三个人想拿这个村妇开开心。……五娘子一听，这三个家伙说便宜话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秀才说：“你作诗也必须按照你的本行。”五娘子说：“有木本念桥，无木也念乔。去了桥边木，添女变为娇。娇娘丈夫爱，胸脯两大块。一边奶和尚，一边奶秀才。松松裤腰带，生下财主来。”秀才和尚、财主听了，羞得满脸通红，好象巴掌掴的一样。……

巧女吟颂的“诗句”谈不上雅致，但其中话语的犀利却是能穿透人心的。除言语之外，她们也有行动，如《李敢娘智破“摸喜”陋俗》^⑩里，李敢娘用剪刀和锥子，既保住了名节，又惩罚了摸喜的族长。她的勇气甚至体现在她的名字里。

前文已经说过，巧女故事的创作是基于民众对现实补足的心理。故事赋予了巧女远远超越于现实的自由和觉醒，所以这些慧黠的女性，在不严重影响家庭利益的情况下，更为关注自身尊严、名节的纯洁。当重孝与守节两种伦理规范发生矛盾时，她们会选择卫护后者。比如《一个虐待媳妇的婆婆》^⑪，当家婆出的难题（做绿帽子）危害到媳妇个人名



节时,民众允许媳妇不囿于“孝”的局限,毫不犹豫地予以反抗。可见,在节孝之间的轻重权衡上,民众的态度是宽容的。对于每种道德要求,他们都设定了宽泛的违规界限。故事赞扬守规行为、贬斥违规举动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听者,只有建筑在民间伦理规范上的言行,才能真正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

故事的讲述告诉我们,巧女角色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的预期而塑造的,因此她们是德才兼备的。对巧女而言,在展现女性才智的过程中,德与才是一体的。守规之德,通过女性才智的应用得以显露,同时又在故事的表述里规范着女性才智上的张扬。它们共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保护家庭与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巧女在故事中被赋予了全能守护者的职责:既要作为女性的女人具备持家守业的能力,安份守己地恪守各种规范;又要作为男性的女人妥善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家庭及自身的困境。这种全能式的要求,让巧女们在故事中陷入了利益与规范的两难境地。协调生活现实与民间伦理规范的关系,成为这些实干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民众寻找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当没有外力危及家庭或女性自身利益时,巧女要做伦理规范的信徒;一旦在男性缺乏或男性庇佑能力匮乏的情况下,出现利益危机,她们可以“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暂时抛开规范的约束,作为男性家庭的代言人与外力较量并解决困境。利益与规范的冲突,并不影响德才的互溶,而且只有德才的互动,才能真正解决两难中的徘徊。

结 语

巧女故事的讲述同其它民间故事一样,在教育或娱乐的形式下,蕴涵着民众的观念和欲求。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设置,每一种行为的表现都渗透着讲述者对现实思考的描绘和愿望的倾诉:面对利益征战,他们既专注于家庭范围内的利益守护,又深切体悟着自身在伦理规范限制下的艰难。

讲述者将故事的主人公确定为巧女,就是要通过这一女性角色在顺应或反抗某种文化压力时展现的言行才智,来叙述他们对女性现实



不利处境的实在认识和补足想象。因此他们虚化了传统社会护佑家庭和女性的强大力量,为巧女故事设置了特殊的活动场域:男性缺乏或是男性庇佑能力匮乏的家庭。巧女是聪慧的,她们安然地持家守成,从未刻意或主动去承担和代表什么,但她们是“不幸”的,因为她们所要倚靠的男人不够强大,不能庇护她们和家庭。为了家庭的存在她们必须强悍,走到台前是时势所推。巧女的层层过关实际是在规范禁忌边缘的游走,巧女的智巧在于她们把握了禁忌的准确尺度。故事中的女性从来都是清醒和理智的,她们清楚男性社会赋子女性的生活定位,也明了她们在家庭场域中的职责,以及社会所能容忍她们触及禁忌的尺度。这种表述足以说明民众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女性的地位也有明智的把握。

巧女角色职责的转换,为女性带来个人与家庭间的两难境地。如何以才能和理智解决困境,是故事意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大多数巧女故事,以男性的失败衬托女性的智巧,让女性成为权利的持有者,享受行为胜利的喜悦,是因为传统认知上男性天然的强势,可以更好地映衬巧女;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男性的打压。如汤普森所说“民间的幽默,总是不去确切地区分笨拙和机智”¹⁸,巧女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背后,其实都是成败与巧拙的交迭。作为现实境遇的逆向想象,民众赋子女性机智、勇敢和大气,让她们作为女性的女人完成主妇应尽的责任,体味情感的自由和持家的重负;同时让她们作为男性的女人,暂时抛却伦理规范的束缚,成为家庭及个人利益的守护者。这是民众所能想到的一条折衷之路,也是一种艺术化的解困方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性别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实际生活里,男外女内的基本模式表明了性别制度对两性活动场域的区分,以及对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两个场域上各有所长的认可,既肯定男性在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权利,也鼓励和保护女性在家庭内部的主妇权。因而对女性而言,家庭活动场域与公共社会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之相关,女性的地位也是随着家庭和公共两个场域的接近与游离而高低变化的¹⁹。如果女性可以超越家庭利益进入公共场域,并被认同为群体一员的话,那么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



地位就会随着她对社会利益的有用程度而提高。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惯以男性把持公共场域活动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故事中的巧女只能作为男性的协助者处于幕后;与之相对,故事作了特殊的安排:引发由巧名外传及男性庇佑能力匮乏导致的家庭危机,促使家庭与公共两个活动场域的逐渐接近。这种情况下,巧女才能够作为男性的代言人走到台前。出于对家庭现实利益的考虑,民众运用想象切断了性别与智慧、品德及才干的关联。如此做法只是将人们关注的视点从男性引向女性。虽然女性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由幕后到台前,但最后的胜利被赋予女性足以说明,民众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倍加关注的。巧女故事体现了民众自己对社会文化角色的性别判断:不以男女性别的先天占有,而是凭借角色职责的实际担当,来决定两性后天的社会文化角色。

民间故事表述的效益——审美形式,为民众弥补现实缺憾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借由想象的翅膀,百姓才能在巧女故事中,以变通的态度来调整规范的限制尺度和情感的需求程度。现实与想象的交织,曲折地反映了民众心中的调试欲望和反叛意识,同时也在这种调试过程中体现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实际的处理能力。

①巧女故事的流传范围是广泛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的范围几乎涵盖全国。而且,它的传承历史也是相当久远的,早在《寰宇记》上卷中记载了两则巧妇能言善辩而压倒文人的故事,但原书已佚,其中一则见《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艺文类聚》卷二五,又见《太平御览》卷四六六,七六九:“刘道真(遭乱)于河侧自牵船,见一老姬采(桑逆)菘。刘调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刺捍,而采桑逆菘?’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乎?’”另有一则《艺文类聚》卷二一五:“道真尝与一人共索种草中食。见一姬将二人过,并青衣,调之曰:‘青羊将两羔。’姬答曰:‘两猪共一槽。’”此注解转载于姜子匡《搜集巧拙女故事的小报告》,《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三十三·民俗学集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

②《巧女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第58—62页。

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 ISBN 中心,1998年12月,第699—702页。

④此俗语摘自《巧嘴媳妇》,《天南》,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1999年5月刊。

⑤“不赔猫”是巧女故事中的一种型式,主要故事情节是巧女的家人打死了邻居的猫,邻居以此猫价值千金为借口进行讹诈,巧女用同样的方法反驳,使邻居的讹诈失败。

⑥《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6年7月。



第 165—167 页。

⑦《秦皇岛民间故事卷》(第二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51—852页。

⑧在访谈中,“能挣钱”也被添加到对女性持家能力的评判中,这个要求同样关系到家庭的现实利益。讲述者康素莲,女,63岁,河北滦县高各庄村村民。在调查过程中,谈到对媳妇的要求时,其他访谈对象都同意她的话,所以此处引用此话。

⑨故事里表现的“守节”,指的是民间女性捍卫名节的行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节操”。

⑩《河北民间文学丛书·宁晋县故事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第317—318页。

⑪《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邢台故事卷(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33页。

⑫调查过程中,访谈对象谈及最多的就是婆媳关系,其中康素莲还说:“婆媳天生是冤家”。其实,最容易引起婆媳之争是她们在情感中的冲突,儿媳作为异血缘的第三者插入相依为命的母子之间,必然引起婆婆不自觉的反感。再加上她们在家务劳动等生活细节上的差异,也会加剧婆媳的不和。故家中不孝行为是被批判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为什么把虐老的事件安置在婆媳而不是翁媳关系中呢?探究一下原因,是否可以把儿媳的举动看作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后的补偿行为,只是这种补偿不是报复在自己的儿媳身上,而在自己的婆婆身上。这种补偿心理虽然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可容忍。它从另外一面反映出婆媳关系的复杂。

⑬有一些巧女故事里也出现翁媳之间的争执,但这些情节更多是为了衬托巧女解救家庭危机时的勇敢和机智。

⑭《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6年7月,第266页。

⑮《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6年7月,第216—219页。

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 ISBN 中心,1998年12月,第709—710页。

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卷·长宁区分卷》,上海长宁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9年4月,第344页。

⑱〔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201页,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译。

⑲琼·凯利-加多:《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8月,第92—97页。

(康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

